

# 盛會無形文化襲產價值探索研究：以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創意製作為例<sup>1</sup>

## The Exploratory Study of Intangible Legacy and Culture Value from Ev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Creative Production of Opening Ceremony at 2017 Universiade in Taipei

林冠文\* LIN Kuan-Wen

### 摘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針對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文化活動襲產，與涉入盛會籌辦 15 位關鍵利害關係人，包含具決策權之政府官員、顧問、導演、聖火台設計團隊成員、舞蹈編排團隊成員、藝術管理成員、表演者等重要參與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使用內容分析法與情況分析紮根理論方法步驟發現，臺灣近期熱議的世代衝突現象，在需要大量藝術創意決策過程、多人共創的開幕文化節目製作中，被多位核心受訪者，一再提及。代際差異在階層流動緩慢的較凝固社會，感受相對劇烈；由於社會權力位置、資源掌握程度，年輕世代均不及年紀較長者，因此，在需要高度藝術創意決策的此文化盛會中，年輕世代受訪者指出，曾被壓抑創新決策權、資源運用；這些年輕世代，在過程中，是如何進行溝通、突圍，深具分析、探究價值。而大型文化盛會，作為一種社會交流、溝通與交陪過程，是否能藉此類事件、平台甚或成為公共領域，減緩或安頓世代對立？本研究試以相關理論，如情感結構詮釋、狂歡節民主化概念、盛會襲產的動態看法與多元競爭公共領域觀點等等，對此議題加以探討；研究結果呈現輔以對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創意製作核心參與者的訪談內容擷取，試圖論述、勾勒此盛會活動遺留下的此種無形文化襲產價值面向之可能。

### 關鍵詞

世代、文化價值、盛會、狂歡節、襲產、情況分析紮根理論、民主鞏固

<sup>1</sup> 感謝許言傑協助逐字稿產出。本文修改前，曾發表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主辦之「2018 文化的軌跡：『界』與『介』- 文化治理與藝文中介組織的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令本文得以彌補闕漏、改善論證，謹此致謝。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國際賽會開閉幕無形襲產認定之研究：以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為例〉(MOST 107-2410-H216-005) 的研究成果之一。

\* 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eng Chia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pproach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focuses on the legacy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2017 Summer Universiade. Fifteen key stakeholders from this event, who were the government officers, consultants, creative directors, designers of the cauldron art installation, choreographers, arts managers and performers were interview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method of situational grounded theory were conducted. The current hot topic on the issue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Taiwan was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views. In the crea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during arts production within this scale of event's opening ceremony, many people with different power distances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hierarchical position with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the members from younger generations could not compete against the older ones. In the socie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slow social mo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might be felt severely. In the case of this research, many interviewees from younger generations mentioned that they experienced the pressure from the members of older ones in terms of creative decision making on arts produc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How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communicating with older ones and dealing with this circumstance are explored. Mega events, as a platform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an intermediary or public sphere, may play a role to mitig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discussion section brings the theories such as "structure of feeling",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implicated in Bakhtin's Concept of Carnival, Chappellet's perspectives on the legacies from hosting events and the multiple publics from Nancy Fraser. Some direct quotations from the interview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describe and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value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legacies of hosting this event in Taiwan.

## Keywords

Generation Cohort, culture value, event, carnival, legacy, situational grounded theory,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一、前言

國際大型賽會的開幕文化活動被許多人認為是影響盛會整體而言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然而籌辦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的成本有逐漸攀升的趨勢。1996年亞特蘭大夏季奧運會開閉幕花費僅約美金兩千六百萬元；然而，自2004年雅典夏季奧運會開閉幕開始，花費規模往上急速攀升至美金九千五百萬元；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閉幕，則據媒體報導，花費超過美金一億八千萬元；而2012年倫敦夏季奧運會開閉幕費用，最終統計約達預算金額的兩倍，達美金一億五千萬；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開閉幕費用，據傳更高達天文數字的美金五億元（Garcia 2016）。

有研究認為，舉辦大型賽會整體的短期經濟投資報酬率有限，且是被誇大的，然而大型賽會卻又能夠帶來巨大的文化效應；因此，許多主辦地（destination）藉由賽會開幕文化活動，來彰顯地方文化、歷史與形象的特色，開閉幕籌辦產生的長期效益（impact）、無形遺產（legacy）因此值得深入探究（Zimbalist 2016）。然而，隨著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的成本逐年攀升的態勢，社會上對於是否需要花費如此鉅額的資源，只為了一個晚上的文化狂歡，有非常大的爭議。例如，媒體報導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閉幕約需花費臺幣三億六千萬元，但該文化活動門票八成以上為臺幣八百元之價位，若僅依賴該活動售票之自償，絕對無法收支平衡；砸國家有限之文化預算、資源於此的意義、優先性何在（謝珮琪 2017）。

但另一方面，也有聲音指出，臺灣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困境，學者形容的「未竟的奇蹟」，導致國人在許多方面缺乏自信心（李宗榮、林宗弘 2017）；因此，藉著舉辦世大運之機會，尋找屬於這片土地之民族自信心，藉此累積臺灣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一種相當划算的作法（林芮緹 2017）。賴嘉玲（2016）就引用學者 J. Hogan、S. Hall、R. Roche、J. Urry 所提出的看法，認為開閉幕此種國際級文化盛會，除了跨國公民文化建構外，也可能成為一種重要國族建構的場所；藉由一組包含影像、象徵標誌與儀式、情節、故事、影像與地景的國族敘事，或可將成員們有意義的生命共享經驗、光榮與悲喜情感，繫在一起。曾柏文（2022）即以 B. Anderson 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為起點，分析城市文化慶典盛會，在臺灣當代公共言論場域裡極度分眾、分裂與強調「敵我識別」標籤化，造成「民主及言論內戰」後果的脈絡下，或許能藉由一起參與文化盛會的生命共享經驗，建構易碎裂共同體內的民主溝通理性與相互尊重文化。

其實，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的成本與資源投入的爭議不僅存於臺灣，

在 2016 年巴西里約奧運閉幕儀式中，下一屆奧運舉辦國日本，普遍獲得外界好評、成功的交接盛會演出後，日本媒體仍然緊迫著負責承辦此文化活動的知名大型廣告公司日本電通（Dentsu Inc.），質疑其為了僅約十分鐘的文化活動，運用約合美金一千兩百萬元日本政府預算之成效何在（Kageyama 2016）。籌辦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活動的社會與文化價值（culture value）可能為何？若此項盛會對社會貢獻的價值顯而易見，為何每每興辦此類盛會時的爭議不斷，社會支持與反對意見併陳？然而，不論在國內外，特別針對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的相關學術研究卻非常稀少。回顧相關文獻，過往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之相關研究，多是以單一參與者、觀看者或研究者之主觀分析侷限感知，來揭露其對社會可能之無形襲產、文化價值面向；因此，對於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所產生之無形文化價值，在這些過往研究結果中，有認定上之視野、成果的侷限性。本研究即欲貢獻於補充此部分的論述。

## 二、文獻探討

國內外特別針對國際大型賽會開閉幕文化活動襲產的學術研究非常稀缺，少數如 Silvers 與 Nelson（2009）在國際期刊 *Event Management* 所發表的學術專文；其以 2006 年冬季奧運會開幕為例，使用盛會活動管理知識體系（even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EMBOK）分析開幕文化活動內容設計的內涵。賴嘉玲（2016）則以 2012 年倫敦奧 / 帕運開閉幕為例，探討該盛會作為複雜事件，如何引動越界文化衝擊、反叛文化重顯契機與激發創意及文創實踐的未預期結果。該研究引用學者 M. Roche 和 J. MacAloon 詮釋，認為開閉幕式是一種特定，包括儀式（ritual）、光景（spectacle）、節慶（festival）與遊戲（game）的媒體事件類型。除此之外，就本研究所知，相關出版研究，大部分是開幕參與者或設計者經驗描述的書籍發表；如 Moon（2012）以倫敦奧運開幕演出的志願參與者身份，撰寫了 *Days of Wonders: Inside th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揭露了自己親身參與大型賽會開幕的主觀第一手觀察資料。另外，Garcia（2016）根據自身從 1968 年開始，現場觀看過的奧運會開幕經驗，收集資料撰寫成 *Secrets of the Olympic Ceremonies*；該書評論了這些全球矚目的盛會，歷年發展的趨勢與內涵。然而，針對開閉幕所產生的無形社會襲產、文化價值研究，卻仍在全球專業學術中相當罕見（Tomlinson 1996; Mobley 2008）。

國內外針對國際大型賽會、盛會（event）整體效益與襲產的研究，或可供為此類研究的參考起點。1990 年代初期，大型盛會活動的效益除了探討經濟與財務

等可量化數據之外，也開始對於社會與環境等相關無形之面向進行討論。因此，大型盛會襲產之概念，開始受到廣泛定義與分類。在國際間大型盛會活動的整體襲產研究，有的學者將舉辦大型賽會能對主辦城市未來社會價值創造的方向，分為直接與間接面向；直接的如，資本流入主辦城市、設備設施建設與升級、交通運輸改善使市民通勤成本下降、觀光客的支出挹注地方經濟；間接的面向則有，城市行銷打造未來觀光商務目的地（destination）形象、在地增加的商業機會、增進的社會融合（social cohesion）與市民榮譽感、凸顯的城市國家國際形象、市民休閒娛樂與福利的提供、產業資源技術的發展機會、為市民創造更具動能的生活（Kasimati 2003; Preuss 2015; Zimbalist 2010）。由這些研究可以發現，舉辦國際大型盛會活動的間接面向襲產，多偏向無形之社會、文化價值。

國內學者則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分別以如 1989 年杜易斯堡世運、1990 年北京亞運、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1994 年利樂漢瑪冬奧、1997 年釜山東亞運與亞運、2001 年秋田世運、2002 年蔚山世足、2004 年雅典奧運等等，進行個案分析，其整理出舉辦大型盛會活動正負面社會價值之案例，期盼臺灣城市利用大型盛會活動，來促進城市發展與體現文化特色，並建議興辦時之財務政策與定位的重要性（許光廬、黃建松 2006）。此外，臺灣在舉辦世界運動會與聽障奧運會後，國內學者張少熙與黃睿宏（2009）便使用文獻分析法，以高雄 2009 年舉辦之世界運動會為例，探討舉辦大型運動賽事，整體而言對城市永續發展的影響。其發現舉辦盛會，對城市的潛在襲產，對內如有助於城市的再生與重整、加速都市建設、活絡當地的經濟活動、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以及增加當地居民的凝聚力等；對外則有助於城市形象的改造，並經由發展成品牌，行銷到國際以吸引國外投資者、觀光遊客、會議人士等目標群體，藉以增加舉辦地觀光旅遊與其他產業的收益。馬上鈞與馬上閔（2010）則以 2009 年高雄世界運動會為例，探討大型盛會活動永續發展之策略，以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面向來設計訪談議題，並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在世運活動前，對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記錄了高雄世運的籌備理念與管理政策，最後提出具體之建議，期望未來臺灣大型盛會活動永續管理政策能更加完善。

基於眾多學者對於大型盛會襲產提出之分類與論述，Chappelet（2012）則以襲產出現的頻率、盛會舉辦後之時間差與盛會舉辦地之人文特質來探討舉辦大型運動賽會襲產之分類。其研究認為，首先，國際賽會舉辦後會留下之襲產，能再以幾項加以分類：襲產性質、襲產效益涉及之區域及襲產與體育的相關性，並以矩陣方式來說明（圖 1）。



圖 1. 大型賽會襲產分類矩陣圖 (Legacies Matrix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

資料來源：作者譯自 Chappelet (2012,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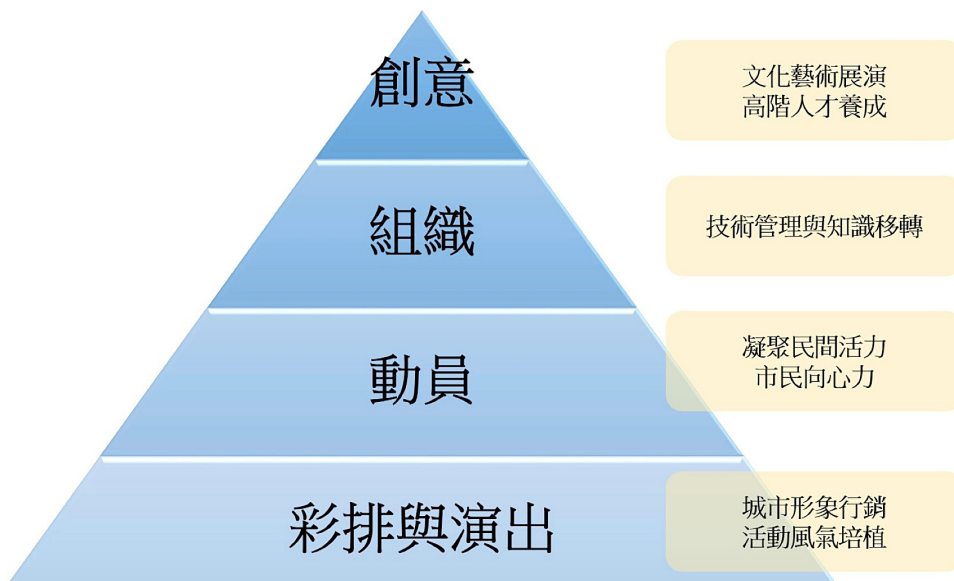
運動無關	有形	無形
運動相關	交通基礎建設 運動設施與場館	意象 運動政策
區域性	獲得新工作 志工制服	獲取技術 運動參與
個人性		

Chappelet 的研究也認為大型賽會襲產會因為時間流逝，造成不同時期之可察覺累積結果不同；部分襲產的感知，則需要時間發酵。賽會襲產感知，也會因為眾多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由於身處不同視角，致產生不同的認知與見解差異。該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最後列舉了數個過往國際大型賽會，在盛會前後發生之特殊事件，來探討這些事件與盛會之間的襲產關聯性，並利用盛會舉辦地之地理區域大小，結合舉辦地人文特質，來說明某些大型賽會整體襲產的獨特性與單一性。此研究提出具突破性的重要論點為，不是一旦舉辦了大型賽會，各種過去研究條列出來的襲產都會發生；且襲產效益發生所需要耗費的時間，也會因為主辦地之人、事、物與社會脈絡，在相異的大型賽會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主辦者安置襲產發生的盛會事前 (pre-event) 規劃、管理至為關鍵，是影響舉辦國際大型盛會，襲產是否能在該地、該社會結構下發生的關鍵因素。

集思國際會議顧問與林冠文 (2016) 於臺北市府文化局委託辦理之「國際大型賽事開閉幕儀典活動執行策略分析」研究案，則是以質性研究法，訪談了數位國際的知名大型盛會開閉幕活動顧問、製作人或總監，如雪梨奧運開閉幕式執行製作人兼導演瑞克·博奇 (Ric Birch)、索契冬季奧運開閉幕式執行總監米克·奧克蘭 (Mik Auckland)、格拉斯哥英聯邦運動會開閉幕式創意總監大衛·佐克瓦 (David Zolkwer)、鹽湖城冬季奧運開閉幕式管理和創意總監史考特·季芬斯 (Scott Givens)、倫敦奧運會開閉幕式執行製作人馬可·白利奇 (Marco

Balich)。該研究使用質性研究的取徑，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法，彙整訪談內容成為逐字稿，在剔除連接詞等贅字後，計算出訪談者所提及頻率高的關鍵字，最後依照關鍵字，再回頭分析逐字稿關鍵字出現處之語意脈絡，整理出訪談者認為國際賽會開閉幕所能帶來的正、負面無形襲產的重點方向分類與內容。該研究整理出舉辦國際大型賽會開閉幕盛會，在不同籌備面向，可能產生的襲產效益如圖 2。

圖 2. 開閉幕儀典活動各層面後續效益  
資料來源：集思國際會議顧問與林冠文（2016，61）。



### 三、研究方法

相對於量化方法企求之單一真實（single reality），質性研究法在方法論之預設本體論立場（ontological position），即為預設多重真實（multiple layers of reality）存在於所研究之問題其社會現象之中，最適於處理細緻複雜、結果發散的研究議題（Strauss and Corbin 1997）。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之原因在於，質性研究之特性為注重建構社會實相與文化意義，受情境因素影響甚大，聚焦在人類互動的過程，受試者或研究個案通常為少數個體，必須做主題分析。而要瞭解人類行為的最好方式，就是融入現場做實際觀察，以便盡可能地把握事實真相（陳向明 2002）。

本研究主要欲討論的核心議題，為探索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文化活動的可能無形襲產、文化價值，並採取 Chappelet（2012）的研究觀點切入。即

本研究認為，國際大型盛會開幕文化活動，是否有無形襲產生成的感知，能從參與者等盛會活動利害關係人的言談中，萃取出來；因此，欲透過本研究來了解利害關係人的內心想法與感受，屬於質性研究法所擅長之範疇。考量此研究議題對每位利害關係人，因其所處之個人情境不同、生命歷程不同，見解或也不一，所以針對本研究關懷問題之回應，也許不見得有一定的答案，回應也可能有著一定程度的複雜性。另慮及若研究者能深入於研究情境之中，對研究問題較能有豐富的分析，因此在本研究之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角色定位上，亦較偏向質性研究方法擅長之特性，以便直指本研究問題的核心議題，進而分析出較有意義之結論。大型賽會開幕活動投入上千名人力，由數百位文化藝術家共同展演出地方文化的當代詮釋，為在地人類行為活動的大規模展示，其所涉及的幕後籌備、創作工作過程繁複，質性研究將能夠收集利害關係人於此過程中的細微資訊，進而設法整理出脈絡。

本研究共計訪談了 15 位世大運開幕文化活動籌辦利害關係人，參考集思國際會議顧問與林冠文 (2016) 先前相關之研究訪談題目設定，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並先以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method)，對所有訪談逐字稿進行分析，再以訪談逐字稿作為文本資料，採用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進行由繁化簡的分類動作，歸納出符合本研究主題之關鍵句和詞語，接下來以分類的結果，發展出系列的編碼結構，逐步由收集的原始資料中，發覺出有用的主題，並且在歸類、比較、再歸類的程序循環中，直到再也沒有新概念出現時，才停止這個程序，以便建立本研究發現的初步理論 (Creswell and Poth 2018)。

迥異於量性研究法哲學，本質性研究預設的結果屬於局部的知識，只侷限在案例本身，不企求推論到抽樣總體。因此本研究中的「推論」包括兩個面向，「認同性的推論」指的是讀者對研究結果得到思想上的共鳴，產生「認同」，在認同中擴展認知結構和內容含量；而「理論性的推論」意指本研究建立的理論或具有一定的詮釋性，即該理論具影響或輻射 (羅德興、王明雯 2012)。因此由建構主義學者 Lincoln 與 Guba (1985) 提出的「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 規準，較適合檢驗本研究結果；其以「確實性 (credibility)」、「轉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dependability)」與「確認性 (confirmability)」，取代了量性研究法哲學用「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與「客觀性」，來建立研究信實度的方式。在本研究中，於進入研究田野之前，研究者能夠辨識在研究初期自身與研究相關的經驗背景、所帶之理論觀點，以及隨之而來可能存有之偏見。因此，於研究初始，本研究即藉由文獻回顧，循環反思可能預設之立場及尋求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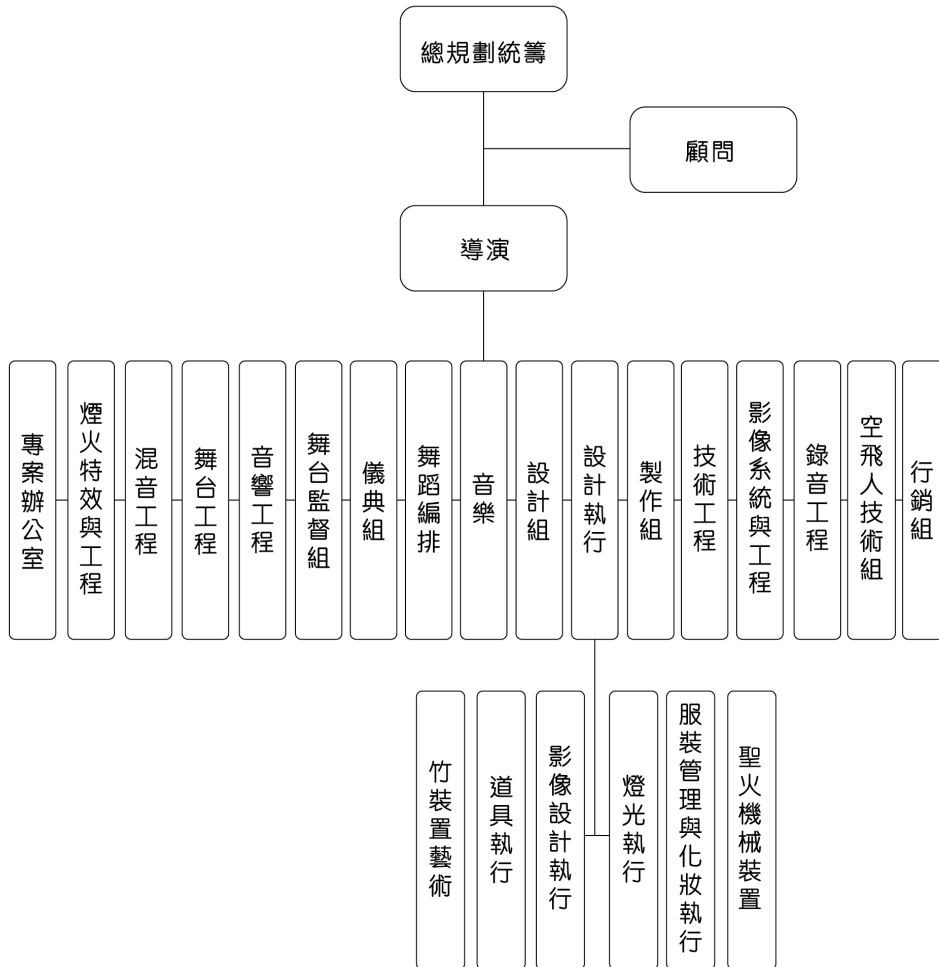


避免影響訪談者之道（Merriam 1998; Rossman and Rallis 2003）。如此，一方面在反芻資料收集及理論建構過程中，不斷自我澄清，讓本研究者反覆看清自身是如何觀想與詮釋所研究目標之現象。另一方面，藉由反思調整的功能，對於研究者原有不當的預設，適時調整於每次訪談過程中，使其不致影響研究的進行。

本研究在設計上亦使用三角檢正（triangulation）來建立研究信實度，該方法通常包含：不同資料來源、不同方法、不同研究者與理論之檢正（Glesne and Peshkin 1992; Lincoln and Guba 1985; Merriam 1998）。例如，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針對同一訪談問題，蒐集導演、藝術顧問與舞臺監督等等利害關係人之看法，即為不同資料來源之檢正；如參與相關論壇與收集媒體報導、評論查閱等蒐集資料，則屬不同方法之檢正。另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除了半結構訪談擬定問題列表，均事先提供予受訪者之外，訪談時並輔以學者 Chappelet（2012）建構之大型賽會襲產矩陣概念圖（Legacies Matrix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圖 1），提供予受訪者表示意見，進行參與者檢核。

考量本質性研究訪談抽樣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之策劃，為一由上至下的科層管理系統（如圖 3）。本研究 15 位受訪者，為包含具決策權之政府官員、顧問、導演、聖火臺設計團隊成員與舞蹈編排團隊成員、藝術管理成員、表演者等關鍵參與者，為由滾雪球（snow ball）之抽樣訪談概念，邀請受訪者協助推介，直到所有收取訪談稿內，受訪者之觀點一再重複，判定資料達到一定理論飽和度（information richness），才停止尋找訪談者（鈕文英 2015）。

圖 3.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典禮執行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7）。



####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 15 份訪談逐字稿，共計 102,190 字，先依 Creswell 與 Poth (2018, 276) 所論及 Huberman 與 Miles 建議的紮根理論操作方式，在初步編碼過程中使用內容分析法發現，「世代」主題相關詞句，反覆在訪談過程中被提及與論述，所有受訪者共計提及了共 120 次。本研究再選擇其所推介 Clarke 與 Charmaz 所建議的「後現代轉向之後」、「建構論取向的紮根理論」典範分析方法，聚焦、再深入檢視訪談稿內容，逐一擷取與「世代」相關回應主題，進行 Charmaz 所建議、較不結構化的資料分析歸類作法 (Creswell and Poth 2018, 118)。祈寄擺脫其所批判的研究者預設「全知觀點 (omniscient) 或稱上帝視角」位置，欲帶著反身

性覺察，進行寬鬆架構下的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以便找出內隱於軸心編碼（axial coding）內、焦點範疇（category）的訪談者語意、情境、社會世界與位置繪圖（positional cartographic map），來分析所蒐集到的質性資料，以進行後續初步既存理論帶入詮釋與可能理論發展型塑（Creswell and Poth 2018，123）。

運用紮根理論蘊含的「逆推邏輯（abductive logic）」，本研究根據質性資料結果，在本節試著找出、分析其中跨文本、規律提及的寬鬆架構下軸心編碼，並從軸心編碼中的選擇編碼主題，設法帶入相關既有理論，來討論、發展潛在理論，同時找出、揭露與呈現導致資料結果的支持資料證據訪談對話節錄（Uri 2015, 139）。具體上本研究採用 Uri（2015）因應「設計思維教育（design thinking education）」議題的獨特性，所推介的 Charmaz 情況分析紮根理論（situational analysis grounded theory）方法步驟。相異於傳統古典紮根理論（classic grounded theory）分析框架，Charmaz 的方法步驟更強調支援、而不是取代傳統古典紮根分析編碼，對原方法步驟可能過於機械化導引與強加主題意識於所分析文本的研究者偏誤，此方法步驟採用較寬鬆架構成果展現，來分析、進行文本編碼與理論發展，更強調源自受訪者的可能理論及參與自鳴性。研究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本節接下來依序介紹結果的三種情況分析地圖與對應編碼命名，並以所發展「故事線（story line）」的厚實書寫方式，來試圖描述研究資料揭露的社會「嵌入、隱網絡、情境、關係」及「權力階層、溝通和機會」（Creswell and Poth 2018，123、126）。

表 1. 情況分析紮根理論法應用於本研究的套用

資料來源：改編自 Uri（2015, 140）。

主軸研究問題： 參與此盛會後，覺得留下何種無形襲產？軸心編碼主題命名 — 世代		
地圖 1：情況分析 （關係成分） 選擇編碼主題命名 — 世代協作機會	地圖 2：社會世界 / 場所 （多元社會世界重疊） 選擇編碼主題命名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地圖 3：位置繪圖 （擇定 / 不擇定之位置） 選擇編碼主題命名 — 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分類編碼依準問題		
誰與什麼在這個情況裡？ （Who and what are in this situation?） 誰與什麼與這個情況有關？ （Who and what matters in this situation?） 什麼組成使得此情況不一樣？ （What elements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situation?）	什麼樣的共同肯認規律存在？ （What are the patterns of collective commitment?） 有哪些突出的社會世界於此運轉？ （What are the salient social worlds operating here?）	什麼樣的基礎議題位置在此研究情境中重要？ （What were the positions on basic issues and topics central to the situation under study?）

### (一) 地圖 1 情況分析裡的關係成分：世代協作機會

首先，研究發現，在被詢問「參與此盛會後，覺得留下何種無形襲產？」主軸研究問題後，許多受訪者提及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籌辦，能夠達到凝聚社會的無形襲產與文化價值，受訪者提到青年世代欲承擔、貢獻於此。例如，有受訪者認為，這種規模的大型文化活動籌辦，能夠有機會來凝聚社會共識，特別在臺灣近年相當分裂的社會共同體下，年輕世代因此想跳下來試試與改善（A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也有受訪者提到，由於 2011 年臺灣曾因高政府預算製作的《夢想家》藝文演出，爆發社會爭議，質疑此盛會是否嚴重排擠其他藝文團體的資源，使得後續社會大眾對於大型文化盛會製作必要性相當疑慮與反感，甚至認為這是浪費納稅人的錢。這也進一步導致藝文業界專業工作者，不太敢碰世大運開幕這樣子有公共性的事物，會覺得這件事情一定結果不會很好，少碰為妙。但隨著這次世大運開幕製作受到廣大公評讚譽，受訪者認為在很多層面上，這留下了扭轉社會氛圍與對此種盛會看法的價值。而跨世代協作機會的出現，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

我覺得之所以會有跨世代這件事情出現，是因為一開始這件事實在是太衰了，就是除非是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否則大家都不會去碰。…我的意思是說，比如說從在找舞監團隊好了等等的，就是臺灣不是沒有做過大型活動的人…為什麼大家都不敢碰這件事呢，因為大家都是覺得是燙手山芋…那我覺得這一次這件事它的特殊也就是在這邊，就是如果說它有什麼價值的話，我覺得它的確是逆轉了一種氛圍。（B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許多受訪者如 C 提及，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籌辦過程、經驗，有助於世代共融與共榮，他們如 B、E、J 也認為，世代合作較佳的團隊，將能創作出更好的文化內容。這也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無形襲產，籌辦國際大型文化活動前、中、後過程而產生的社會與文化價值。然而，有些受訪者分享身為年輕世代，在籌辦過程中，與前輩世代顧問工作相處時，遭受「家長式（parentalistic）」合作的感受。例如，有受訪者提及，由於在臺灣缺乏這種規模的文化盛會活動籌辦演練機會，這種需要跨國、跨業與跨世代等等橫向聯繫與匯聚力的專案，在習慣只做好自己領域的格局環境下，雖然彼此單獨的技藝可以做到很好，但就像只能做代工一樣，遇到複雜的整合型專案，尤其又涉及跨世代合作，就非常挑戰。而跨業、跨國平常或都還有機會演練，然而在華人傳統思維下，世代間長幼階級觀念很深，忘年之交這種較平等、跨世代地去交朋友比較難，若又涉及師徒輩分關係，成員間專業決策上就

很難平等，且雖都說希望自己年紀大了之後，千萬不要變成老一輩的樣子，但屆時不顯露出上對下的心態又很難。受訪者認為這或許跟臺灣社會裡，缺乏跨世代生活上面的交集有關，缺乏一個共同的比如說下班之後、假日約去彼此家吃烤肉，或者去酒吧等第三場域（third place<sup>2</sup>）裡面喝酒放鬆交際的機會，或是文化習慣上像外國人彼此直呼其名、抹去輩分與階級稱呼的慣常，其認為在那樣的環境裡，專業裡的跨世代、跨年齡層那種經驗傳承，是可以比較自然的（A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C 受訪者：如果世大運（開幕籌辦）可以是一個案例，如果世大運的這種翻轉可以是一個案例或是互相信任的可能性，就是（未來）世代之間互相信任的可能性或是早一點承傳…因為當我們現在在回想前一輩對我們是一種很父權的，反正我就教你。（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B 受訪者：我喜歡的說法是共創，就是只要可以能夠以這樣的心態一起工作的人都可以一起工作就是…我覺得那種共享跟共創的心態非常重要。若是你一定想要把持什麼事的時候，你就不可能讓這些人完全發揮，我必須那麼說，是真的。（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E 受訪者：我覺得在一個大型活動裡面，在一個規模那麼大的活動裡面，我覺得年輕一輩的創意，需要他們（的）創意去贏得時代的認同，但是安全性和完整度跟它的國際性，其實他必須有年長一輩去瞻前顧後的。（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J 受訪者：我覺得在這個案子裡面我看到很有趣的現象，是我學會彼此之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專業，因為你會在整個團隊裡面聽到很多種不同的聲音，然後在整個團隊裡面年齡層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有很資深的專家學者們，然後也有很有經驗的、很國際性的導演顧問，然後也有一些很新生代的，然後後來有一些是他在這個表演藝術專業裡面，但是他並不是導演，然後你在討論的過程中，就會看到他們不同專業對於同一件事情的觀點是很不一樣，因為大家的生活背景不一樣。（選擇編碼主題：世代協作機會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

2 學者 Ray Oldenburg 的第三場域理論指的是社交生活中的一個概念，特指非家庭或工作場所的第三個地方。這種地方通常是社區的中心，提供人們與朋友、家人和社區成員相聚的場所，促進交流和社交互動。第三場域通常是非正式的、輕鬆的場所，例如咖啡廳、酒吧、公園、圖書館或廟埕等等。在這些地方，人們可以放鬆身心，享受社交與交流，打破日常生活中的孤立感。這種社交互動被認為有助於建立社區連結與深化民主的良好運作，並促進文化交流、創造力。



## (二) 地圖 2 社會世界 / 場所裡的多元社會世界重疊：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幾位前輩世代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及、肯定年輕世代團隊成員創新能力，認為新世代工作的方法，有助於文化內容創新。例如，受訪者提及，年輕世代已經比較能夠脫離他們前輩世代的慣習，辯論決策時能夠較對事不對人，中間即使有很多爭吵與不愉快，不會之後老死不相往來，還是會互相幫忙。透過這樣的合作方式，他們挖掘、產生的在地文化共識決策，自然能有新面貌（A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如 C 也在訪談中提及，對自己的創新管理方法具信心，期待被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給予更多的信任。例如，受訪者提及，前輩世代在開會時，常提及與展示自己以往做事的方法與典範，如分享過去排練時的工作畫面，裡面會去罵表演者、發脾氣，互相拍桌吵架與對罵，來質疑他們年輕人為什麼不這樣做。然而年輕世代認為，這次參與排練與演出的大多是義工，用上對下、英雄式威權的溝通方式去讓大家服從，在他們這輩以降，已經不信任這種方法論，必須能夠讓義工參與者認同這個演出，他們的表情和狀態才有可能有榮耀的，才有辦法動員這種大型活動的參與。而這種工作文化方法的內部論戰，藉由排除長幼輩分因素，純比較專業上哪種方法比較能夠串聯團隊，在這次盛會裡，產生了一種無形改變中的文化價值：

我覺得這次有一個成功，我相信也是在於年輕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樣的…就是威權這件事情，不 work，大家不相信這件事情，所以任何想要用這種方式工作的人，都會被自然地淘汰掉，包括可能有設計群、可能有導演群等等，甚至是表演者也都會被淘汰掉，因為那個方式就是它過時了，我必須這麼說…這個汰換機制有它實際的一個條件，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潛在的氛圍，一定是、的確就是這個社會變得不一樣，它就是改變了。（B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C 受訪者：可是新的世代出來，他們有一個新的語言，可是這新的語言，應該是說我們不太容易知道…就是說我覺得老人才應該要變，年輕人反而不應該變，因為我覺得年輕人那個力量是很堅固的，他今天可以衝很快，然後很多（創意）想法。（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如 C，在訪談中也提及，他們感受到某些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質疑他們創意工作方法的壓力，並想藉此機會展示自己世代下認同的創意工作形式潮流。他們並對於某些前輩世代團隊成員，藉由「跨世代」、「共榮」與「共融」等這些語彙下，隱藏的潛臺詞，敏感地表示出壓力與不舒服。例如，

受訪者提及在團隊內溝通時，經常聽到「年輕人」這三個字跟「跨世代」，隱藏的意涵、潛台詞可能指他們「沒經驗」。尤其前輩世代老愛提及自己2009年高雄世運的當年勇，但年輕世代認為現在條件不同，應理性分析過去經驗的不可延用性，包括市府工作與組成團隊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而當看到另一方面，世大運開始啟用一系列年輕團隊，用比較新潮流概念推出的廣告影片，成功獲得社會讚許時，年輕世代成員同時感覺相當振奮：

振奮的點就是覺得說，終於不用再看老梗的東西，就是那些東西到底要演多久，就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次的開幕演出真的是非常有經驗的（前輩世代）另外一批人來做的話，我相信他們會做出截然不同的東西…我覺得在我們特別是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會很強烈地感覺到說，大家對打破威權的恐懼，是真的就是各種層面的。（B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C受訪者：在溝通的時候，那種上一個世代的霸權是很強的…這就是我要講的，世代之間可以正義但是不要狡滑，你不可以說我們成長了，然後你來跟我說我之前吼，那個都在叨你啦，你現在（因此）成長了，不能這樣。（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一些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於訪談中，如B、C、D具體地提及與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的信任關係，需要花費一段時間的建立過程。

B受訪者：我覺得最搞笑的，就是每次我們開完會啊，他們大人們就會自己去一個小房間開會，然後在裡面開開開開，然後不知道在討論什麼，然後我們在外面等候這樣子，在剛初期的時候，然後我們就會想說，我們是你的員工嗎，就是為什麼我要在這裡等你…（信任建立）那個過程是很漫長的，非常漫長…我覺得那種共享跟共創的心態非常重要，若是你一定想要把持什麼事的時候，你就不可能讓這些人完全發揮，我必須這麼說，是真的。（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C受訪者：當有一些信任開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怎麼這個事情開始比較順了，這個是我認為我們可以去談交接，或是去談承傳或是留下什麼，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些時刻。（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 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D受訪者：如果我們不去增加自己的被信任感的時候，就會遇到（衝突）這個狀況…下個世代必須去創造的一種可能性，就是說這個信任

跟自信…到底藝術家在什麼時候可以失敗，然後才能（被認定可以）去成功。（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部分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在此盛會籌辦過程中，亦學習、發覺了與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的相處之道，深覺獲益。例如，有受訪者認為，這次的合作經驗很寶貴，一開始進入團隊時觀察到，若老一輩的態度跟方式不轉變，不以一個平等與合理方式相處的時候，年輕世代不會給一個對話的機會。平等地去對話、卸下心態上的輩分包袱、只針對事情在講，年輕人似乎就是要這個。當顧問心態上從決策都在自己身上的製作經理（production manager），轉變為針對目標為導向的陪伴與支持型教練（coach）時，跨世代團隊運作才整個效果變好、開始合作：

還有現在很多老一輩都說，唉，講不通算了，我以前也是，但是我現在會覺得說，已經沒有辦法再 walk away，因為它就是你的環境。（E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 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某些前輩世代受訪者如 A、K，更進而協助年輕世代團隊成員，抵擋其它前輩世代團隊成員，對其藝術創意與決策不必要的干涉，這個過程促進了世代共融、共榮。

A 受訪者：（前輩世代政府官員）願意去扛住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政治干擾，然後真的只要政府方面願意，那就容易了，那個方向就出來了，方向出來後就放手讓他們做，然後我的工作就是抵擋那些七嘴八舌，然後再來去看他們技術上面有沒有什麼問題，發想要考慮到什麼層面，可能因為他們都是小劇場出身的，但你把它放到那麼大的時候，事實上會有些盲點不知道，有些東西在視覺上面是不成立的，那到後期後，我們不會去質疑說這個美學，而完全是幫他看安全，結構的安全，進出的安全和節目跟節目的銜接上會不會有問題，只是在這方面。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經驗。（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K 受訪者：其實你看那個組織表框架（圖 3），就是其實有一群人是不在工作團隊中的。所以像是這種權力式的工作框架中，還是會有一點，也不能說封建思想啦，就是傳統上還是會希望有組織和權力架構性。所以過去我的角色有比較像是要改變這個現狀的，所以需要一個獨立的團隊，然後才有辦法往上去推動改革。（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而一些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認為在創作過程中，是有意識地留給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空間與尊重。

A 受訪者：在這過程中也有給他們機會換人，（顧問）不會說堅持說你一定要用這個人把它做完，因為真的是發展一大半了，然後（我們叫你）換人就換人，所以說還是有給年輕人空間跟尊重。（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 （三）地圖 3 位置繪圖裡擇定 / 不擇定之位置：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一些前輩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如 E 認為，藉由國際大型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籌辦過程這個中介平臺（intermediary platform），自己也學習了如何傳承。其認為學習該如何傳承，對前輩世代來說，需要時間醞釀。例如，有受訪者提及，其原仍覺得自己一直還在仰望、依附在更上一代中，然透過世大運開幕籌辦，發現自己已處在一個有些資源可以去分配、被逼著必須變成導引者或是一個導師的身份，而這也是需要學習的過程。如何於陪伴下一世代的過程中，盡量沒有讓他們有穿小鞋的感受，進而也開始思考與懂得將來如何也再傳承給下一代，學會放手與信任年輕世代的過程，是一個很好也必要的經驗：

一開始會想說這些（年輕世代）沒有做過大劇場的經驗，大部分都小劇場，可以做這個嗎？可是後來想想，臺灣也沒有多少機會可以做大劇場，所以看過去，大劇場數來數去就這幾個人，所以你想說這次還是這個世代來做嗎？那就太可惜了，就沒機會讓他們學習，端來端去又是端 x 老師出來、端誰出來，那有意義嗎？好像不太對。（A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E 受訪者：我自己最近在努力的事是跨世代的合作，就是我也在幫六十幾歲的找位子。我坦白講，因為你五、六十歲，你的經驗已達到一個程度，沒有那麼多位子。還有就是，並不是每個（前輩）都會去坐那個位子，但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劇場界或是表演藝術界，我們都有自己的專長，所以也不見得是去做那些館長之類的位子。但是問題是說，如果我們不下來，後面的人上不來，然後我們就一直抱怨他們沒經驗。所以我現在很鼓勵，就是說資深和資淺的人不是不能合作，兩邊都必須要敞開心，才有辦法去合作，那個信任關係一定要被建立，然後我覺得，我通常都會從自己或是身邊的人開始，我覺得有用，但可能不是那麼快，因為劇場本位主義基本上還是很重。（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有受訪者也進一步指出，世大運開幕製作這樣的籌辦經驗，給了臺灣年輕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一個很棒的舞臺表現機會，留下他們的貢獻功勳。以往所做舞臺劇或是演出的導演，都沒有像這次所呈現的那麼大規模與充滿多重與未知的挑戰。而這也對那些沒有辦法參與到這個活動的年輕、時代青年，提供一個很好的指標，就是這樣的機會是由市政府主導，也就是說用公權力支持的。這釋放出一個訊號，這種規模與國際能見度的決策，是可以讓年輕人參與，不會像以前一樣的刻板印象，主控權會被把持在一些非常有名氣的前輩導演手上，年輕世代的導演或是藝術工作者們永遠、這一輩子都不會到他手上的一個機會：

我也在想世大運留下了什麼，她對於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很棒的舞臺，這一定是一個很寶貴的無形文化資產…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留給現在年輕世代的很好的東西…對於這三位年輕世代的導演來說，這是一個很可貴的、跟國際層別的導演去做溝通的，就是如果現在他們沒有參與到這個案子裡面來的話，他們是很少機會去跟國際級的導演，去交換這些國際級的視野跟他們的思考邏輯、跟一些看事情的觀點。（J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然而，受訪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如 C、F，在與前輩世代工作同時，心中想像的承傳方式，似乎有時與前輩並不太一樣。

C 受訪者：來談如何交接我覺得這個議題就是上一個世代，代表我們不夠年輕，代表我們不夠活、不夠開放。所以我更喜歡去聊，比如說當它可以是個 legacy，他的形式有多少，那每一種形式大概可以怎麼保存…因為這樣的東西是不會留結論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樣留，這個時代那樣留，可是始終「留」是什麼意思，就是後面的人要可以「解讀」…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眼光在看這個東西，而且沒有這個已經不行了，如果我們再不去認知到「編碼」和「解碼」這中間的關係的話就不行，可是我講完這個，（前輩世代）完全沒有人理我欸<sup>3</sup>。  
（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 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F 受訪者：該下一代做的事情的時候，絕對是讓下一代做事情…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在這過程中…實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在這過程中，我們開始擁有比較多的資源的時候，事實上應該是要為（再）下

3 學者 Stuart Hall 的「編碼 / 解碼」理論指出，訊息的意義在實踐中必須被發聲和連結 (articulate)，否則無法發揮效果。這意味著訊息的解碼過程不僅受到編碼者權力和意識形態影響，還受到接收者的主觀能動性與社會位置等等的影響。此外，存在著霸權文化順序，它加強某些論述的合法性和制約力量，試圖將論述階層化。然而，訊息接收者有時具有主觀創造文本符號意義的能力，並能藉此抵抗媒介所主導的意義。這種理論強調了訊息解讀的互動性、主觀性以及權力和文化背景對於意義生成的影響。



一代打造的不是方向，而是一個環境，那個環境是可以讓他們不會迷失、不會故步自封、不會在象牙塔裡。（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但某些年輕世代團隊工作成員如 G，也是能體會到前輩世代團隊成員，學習該如何傳承的難處。有受訪者如 K 提到，從一開始進去工作時，覺得與前輩世代溝通很難過，然後慢慢地學會換位思考、站在他們的角度想，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決定，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子想，這時候才會知道，其實大家都是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已，只是思考的出發點不一樣：

那其實在工作過程中，我也學會怎麼樣去說服自己、同時要說服別人，這也是我在世大運的過程中學到的，很多人會質疑你、會對你的決定打個問號，但是當別人對你打問號的時候，那個問號其實早就出現在你心中，就是當一個問題出現在你心裡的時候，你要怎麼去回答別人的那個答案，其實早就在你心裡面糾結過很多次，那只是當你講出來的時候，你只是把你心裡面的那個過程說出來而已，就是練習溝通，這整個世大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K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G 受訪者：因為那個輩分的人，其實東西就是他們創出來，沒有交棒經驗…我覺得對我最大的助益，就是有很多我們未知的東西，所以不能去下定論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蠻需要學習的。就是說，你不可以什麼事都不知道的時候，然後你去做什麼回應和反應，我覺得這都不對…不抱怨，然後解決問題，當然罵一罵也蠻舒服的，所以我覺得大家的素質蠻好的…我的任務也是下一輩，就覺得說我們這一輩要怎麼帶領下一輩。（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 **（四）討論：國際大型盛會文化活動籌辦裡，「世代協做」練習與磨合的時代價值**

本研究藉由訪談收集資料，逐步對焦問題意識，展開針對世大運開幕文化活動籌辦所產生無形襲產、文化價值的發掘。研究結果呼應過去相關文獻所提及的，在不同時空與社會發展背景下，參與盛會籌辦者所感知的襲產，可能有細緻的差異與獨特處 (Chappelet 2012)。例如本研究發現，「承傳」或「世代」衝突、共融與共榮，此項議題是目前臺灣社會現在進行式的一個熱議，而這個議題主旋律，就本研究目前所知，在其他國際相關盛會無形襲產的相關研究，並沒有被特別提及，而大致以社會融合此大類項下來粗略地討論 (Kasimati 2003; Preuss 2015; Zimbalist 2010)。

本研究因此主張，盛會籌辦所產生的無形襲產，除了過往以分類為目的性地討論，確實有需要以更進一步，細緻化、針對特定社會脈絡、獨一性的討論方式，來進行未來研究。例如，本研究所訪談者，部分有在國外、不同社會、歷史紋理下工作的經驗，他們感知，本研究發現的「世代承傳」議題，在其他社會的盛會產業專業群體裡，並不明顯存在。因此，也提及了他們主觀上的詮釋看法；部分受訪者認為，世代承傳這項議題，在西方較民主先進社會中，世代間已經發展了一個系統化的文化慣性作為，來面對、解決此議題，而這已經潛移默化地存在於該社會互動裡，有一個機制能去減低這個社會階級融合過程的問題。部分受訪者因此提出，這可能是此項「傳承」議題，罕見被西方研究者在其相關研究中特別辨識認定，對其社會具籌辦盛會的特殊無形襲產價值。有受訪者認為，西方民主化較深社會中，可能因為不同於東方晚近的社會文化價值慣性邏輯，已經能夠較自然地、跨世代地協同創意工作，因此，在其社會系統下，藉由盛會籌辦這個中介平臺，讓此議題發酵、面對與處理的價值並不顯著：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還是回到一個 society 的結構的問題，因為做一個製作，不管是活動製作或是劇場製作，它的流程的邏輯基本上是一樣的，但是為什麼我跟你說，我每次在臺灣待個幾年就會回香港混個三年，因為我在香港一個英國朋友那邊工作，然後都是跟老外，是因為我覺得我要回去一個比較 sensible 的一個氣氛，因為我最近在雜誌有一篇專欄，我這個月就要寫同理心與同情心的事，它根本是兩件事情，可是問題是，在臺灣就是到最後大家就是從個人開始，其實我覺得你剛剛說要做那個計畫，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只是去訪談所有人，其實我覺得以臺灣的整個社會的習性來講，你還是要幫他們整理出個規範來，否則我跟你講，每個人都覺得聽故事一樣，他不會有感受，就是因為臺灣人在某些程度上面，我覺得我們長期以來的那種填鴨式的教育，或是被教導這件事已經太深了。（受訪者 E，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權力階層衝突與溝通 / 世代承傳無形襲產價值）

因此，相對而言，目前在臺灣社會中，籌辦國際大型盛會文化活動，在現階段，似乎能夠產生出「世代協做」練習、磨合的時代價值。臺灣社會現正經歷權力集中被解構的時代，新世代因為生命成長經驗差異，面對前輩世代傳承方式，有新的溝通看法，甚至不是只有在世大運開幕文化活動籌辦中看到這種傳承、世代共創上面的感覺糾葛（聯合報系 2018）。

然而，世代衝突（generational conflict）此項議題，在西方管理學領域仍被特別指出，起因可能為世代溝通方式、數位時代新工具的流行化、互惠的尊重方式差異、對能產生工作效率方式的不一致觀點、對能掌握工具的安全感不同等等因素造成（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8）。這顯示出，不論西方社會、東方社會或臺灣社會，世代衝突或許正以不同的展現方式，在不同群體合作關係中發生著。世代群（generation cohort）因為擁有同時代成長的經歷，容易成為在社會歷史過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因而產生趨向一致的思考與體驗；而具有相同集體記憶、共享生命成長下的社會文化，容易讓同一個世代群，享有類同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而這種結構形容，試著捕捉在經驗與表達之間模糊的意識感受；學者認為，在特定社會面臨劇烈轉型期時，不同世代群社會成員間的情感結構，一種難以言喻、介於表達與經驗中的鴻溝，會特別顯而易見（王學琛 2018）。

德國學者 Karl Mannheim 在 20 世紀 50 年代，以社會學角度，開展了世代群的相關研究。未來以此種研究路徑、工具，進一步來分析臺灣的世代衝突相關現象，或許能夠提供一條系統性的道路，來更進一步分析此社會現象（翁志遠 2016）。而英國文化理論學者 Raymond Williams 提出的情感結構理論，對處在人口結構轉型、貧富差距擴大等等社會轉型劇烈，年輕世代情感結構經歷強大衝擊裂口的此時臺灣社會，則或許能夠提供一種跨世代詮釋上的理解，進而期待分析結構困境的因素，為臺灣年輕世代「厭世 / 不想努力了」、「我就爛」式地抱怨世代不公，找尋出口（吳承紘、關鍵評論網 2017）。例如，研究指出，年輕世代熟悉網路科技的生命成長背景，使用網路科技此平臺發聲，成為一種抒發情感結構困境的集結抵抗出口（王學琛 2018）。

唐鳳（2018）便形容，臺灣世代衝突的爭點，有些可能來自世代不同教育訓練背景、生命成長歷程下，產生的價值認知差異，這與臺灣民主發展的進程，或許有關係。臺灣從威權體制的由上而下、單一真實信奉原則，到民主轉型後，鼓勵多重真實存在的開放哲學，因此社會成員存在不同生命歷程、紋理所形塑之個體，所導致的價值觀不一致，這些或許是造成世代間認知與行為上差異的原因之一。她表示，西方先進社會民主發展是以百年計的時間跨度，用逐步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實踐的方法，來因應這樣的跨世代信仰價值觀差異之議題。而臺灣威權轉型初期民主的時間點，剛好與網際網路革命時代巨浪重疊。網際網路使得開放、翻轉治理機制系統或許可行，但在眾多網路的相關實踐當中，哪些可以成為規模化的社會創新，進而能夠有效降低世代階級對抗，則還需要時間來

觀察、研究。然而，目前在臺灣進行的社會創新實踐中，藉由引進一項項對各世代而言，均是全新的工具、平臺或系統，如 AR (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等等，讓各世代成員都能透過，對其而言均是全新的平臺，貢獻、發表參與或留下自己的價值足跡，而這等於對各方都開放一個相對較平等、等距的權力機會，或許能夠降低世代階級對抗。

### (五) 討論：以文化盛會籌辦過程為公共領域的再民主化價值可能

而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中，我們似乎也可以發現，盛會活動籌辦、治理，作為一種參與人共同體驗營造的平臺，似乎也有機會容納世代共創與溝通的足跡 (Getz and Page 2016)。俄國語言哲學家 Mikhail Bakhtin 提出的狂歡節 (carnival) 中存在的民主化概念，則提供了在臺灣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民主深化或稱再民主化過程中，具有政治性意圖的展演與奇觀之國際性賽會開幕文化活動籌辦過程，詮釋與討論促進世代共融價值之潛力起步理論架構 (李芝瑩 2017; 林宗弘 2015)。在狂歡化 (carnivalization) 的創意治理實踐過程中，不同社會、權力階層的語言有空間彼此滲透，因而有機會在眾聲喧嘩的多元價值論述併呈時代，尋找彼此溝通、對話與理解的可能<sup>4</sup> (王孝勇 2011)。王志弘 (2015) 便提及，發生在城市發展與治理複雜脈絡裡的節慶盛會，若從行動者網絡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理論轉換視角觀點下，引伸詮釋籌辦過程場域中或帶有倫理或權力關係難題的生活日常與異常，都可能需要持續不歇的翻譯政治分析介入，以肯認各方的主體性價值，讓彼此在劃界與跨界的網絡化行動中，一起生活共存與探討所蘊涵的道德、倫理與正義問題<sup>5</sup>。在本研究世大運案例中，世代間的決策溝通方式選擇、語言使用與互惠尊重方式，可能存在差異，進而產生權力階層的壓迫感，影響了互信建構，但也因此有了一個相互探索主體性價值與轉譯彼

4 學者王孝勇在〈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一文中，著重於探討語言主體如何透過解構主流意義系統的過程中，將其再建構的面向對民主化的意義所在。Bakhtin 的語言哲學立場尤其強調語言主體如何運用狂歡節的概念，從語言使用的當下情境以及語言的社會性等層面，為民主化的語言過程提供具體的例證。此外，透過重新閱讀「批判取向論述分析 (Crit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CODA) 的理論架構，可以反省其中的理論困境，並且打造一個更為整體性的理論平台，來接合其理論架構中，看似各自分立的論述。總而言之，該研究著重於探討 Bakhtin 的狂歡節概念，如何具體應用於民主化的語言過程中，而語言可藉由翻譯，來接合原以為各自分立的論述。

5 學者王志弘在〈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理論性的探索〉一文中論述的主張是，城市不僅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場域，更是翻譯政治的場域。此文認為，城市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多種族、多語言的地方，必然產生文化的交融、翻譯的過程。這裡的翻譯，除語意翻譯，也表交流、橋接與轉化的意思。在城市中，各種文化和語言之間的翻譯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翻譯過程也反映了權力、政治和文化的關係。因此，城市不僅是一個翻譯政治的場域，也是權力和文化的辯論場所。其主張，在城市中要關注翻譯政治的過程和力量，以及如何透過多元文化和語言的交流，促進平等、多元、開放的社會文化發展。「重新界定城市是一個翻譯政治場域，並提出三個層面的分析指引：城市是符號與資訊溝通的翻譯場域；城市是制度化社會互動的轉譯場域；以及，城市是技術中介之新陳代謝的轉換場域 (p.4)」。



此語言真意的溝通平台，來逐步降低世代（階層）衝突與敵意：

年輕人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就是用舊的文化來做新的事情這樣子，那這東西是目前臺灣混雜的狀況下，年輕人找到了一個方式去找到自己的在地性嘛，所以這個當代化的事情，我覺得是一個蠻年輕的、蠻美學上的實踐的方式…這個東西在文化上、在美學上都是同樣的東西，我再把這些東西混成大家共同認同的，那就是一樣、就是整個事件的過程，我覺得這個東西、這個精神或是這個方式被認同…它就會被期待有主體性，因為它的實踐過程是成功的、是認可的，那它就有實踐的可能。（E 受訪者，選擇編碼主題：世代承傳無形製產價值）

而馬元容（2003）引入 J. Habermas 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認為文化盛會節慶活動，在臺灣民主社會環境變遷下，有潛力成為住民彼此對地方發展議題探索的公共平臺與凝聚生命共同體之所在。其分析認為，文化盛會節慶籌辦討論的過程，不論是臺灣的廟會或是希臘的城邦戲劇節，若同時為城市的公共事務時，就是在設法塑造一個公共領域環境，但唯有參與者能意識節慶與自身私人領域的經驗相關，參與度才可能提高。龔卓軍（2022）亦分析臺灣節慶廟會籌辦與執行過程，各方「交陪」創造性溝通過程中，隱含衝突、對抗、革命、調解與協商等等締造當代社區與關係交往聯結的特異力量，可以解釋為一種民間社會力量展演的部署<sup>6</sup>（dispositif）。然而藝術介入社會產出的事件（event），對於該特定社會與時期的公共空間、領域或場域營造是否有幫助，仍需要人文環境理想條件的支援（王品驊 2012）。

更進一步考量 Habermas 之現代性哲學論辯與 J-F. Lyotard 後現代知識論述的觀點論戰，溝通理性環境被批判為一種民主公共領域規範理論（normative theory）、太過理想國原型與布爾喬亞式倡議，因此或可由 Lyotard 所提議的局部決定、小敘事（local/mini interpretations）或 N. Fraser 的多元競爭公共領域（multiple publics）觀點戰略來過渡，並將溝通的技藝由理性擴延至情感上的修辭政治（楊宇松 1998；林宇玲 2014；容邵武 2015）。在本研究世大運案例中，國際性賽會開幕文化活動龐雜的多線籌備與進行過程，確有潛力允許多中心的眾多小敘事，存於可能威權的強加共識主旋律裡，創造潛在社會變革行進的能動力與對

6 學者龔卓軍在《交陪美學論：當代藝術面向近未來神祇》一書中，論及當代藝術應回歸庶民文化，融合民間藝能之美學思維，並從臺灣民間廟宇之間的動態「交陪境」中，尋找當代藝術與民間藝術之間的交互滲透和內在張力，勾勒出新的藝術話語路徑。「交陪」在廈門話中原含有交易、買取之意，或於臺詞辭典定義為交際應酬、互盡友誼、彼此密切往來意涵。而臺灣節慶廟會的籌辦與執行過程，展示了「交陪美學」理論的應用場景，即當代社會中各種不同領域、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這個論點也突顯了「交陪美學」對於理解現代社會中的文化現象和社會關係的重要性。



抗性公眾 (counter publics) 的轉換潛力。李思薇 (2005) 即引入對溝通理性的共識霸權主義可能弊端之解方來分析，其認為在臺北的一些文化盛會中，文化作用者 (agent) 的眾多小敘事，有潛力成為溝通策略的權力戰術 (tactic)，能造就生活裡「且戰且走」的文化戰役；因此，每一次的文化盛會籌辦過程，都有機會成為文化論辯戰役與社會教育的試煉場，一個充滿競爭活力的爭勝公共領域 (a vibrant agonistic public sphere, 林宇玲 2014)。而如楊州松 (1998, 88) 所分析期許，臺灣的社會教育已不止於教室內專屬，生活世界處處可以是教育場域，教者與受教育者亦無主客體之分與長幼輩分、身份尊卑標籤，而「教育之目的為民主心靈之涵養」<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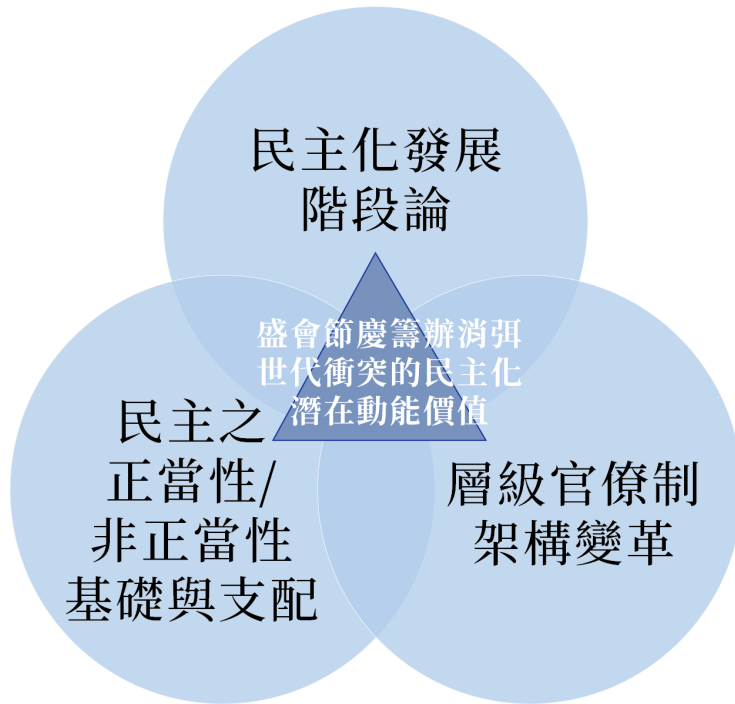
本文因此主張，此類文化盛會節慶籌辦過程，應期許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與再民主化的養分，盛會籌辦領導者們，應對籌辦決策過程所需要的理想言說情境<sup>8</sup>和參與者溝通理性環境、互動條件悉心呵護，使其文化與社會襲產價值極大化與茁壯。而以情境分析紮根理論法進行本研究結果的揭露與理論套用討論及發展，如同 Uri (2015, 150) 引述 Clarke 所言，僅為「瞬時分析的快照 (analytic snapshot in time)」，未來後續研究，建議可引入更多如民主化發展階段論、民主之正當性 / 非正當性基礎與支配、層級官僚制架構變革等等可能相關理論及哲學思潮脈絡，來更進一步探索盛會節慶活動籌辦過程，其中可能蘊藏消弭世代衝突的民主化潛在動能價值 (圖 4)。

7 學者楊州松在〈哈伯瑪斯 (J. Habermas) 「現代性哲學論辯」與李歐塔 (J-F. Lyotard) 「後現代知識論述」的論戰及其教育意義〉一文中論述，無論是現代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都認同在遵循啟蒙運動以來，追求理性發揚的人文主義路線下，教育公眾要尊重差異性，避免威權主義。要達成這一目標，需要在各種社會情境中，維護理性民主，以確保不同觀點都能得到合法發言的保障。舉例來說，這包括挑戰父權、白人、男性等「支配性論述」，並質疑某個世代、族群共有的記憶所構成的傳統社會文化地圖，以及歐洲主義在人類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這些都是「邊界教育學 (border pedagogy)」所追求的跨越邊界、打破意識形態的努力。

8 學者黃瑞祺與陳閔翔在〈審議民主與法治國理想：哈伯馬斯的民主觀〉一文中分析 Habermas 的民主理念與溝通理論。在具公共性的議題論辯前提上，各方需先營造「理想的言說情境」形式條件，才能進一步辨識議題討論產出的是真共識還是假共識。四種言說行動的有效性聲稱分別為，可理解聲稱、真誠聲稱、真理聲稱與正當聲稱。而這種溝通理性判準要求，在語用學框架內概念化後，可以看到西方傳統價值的真理、自由與正義三種理念。

圖 4. 建議後續研究之理論可能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 參考文獻

- Creswell, John W. and Cheryl N. Poth 著。李政賢譯。2018。《質性研究的五種取徑》。臺北市：五南。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著。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臺北市：巨流。
- 王文科。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
- 王孝勇。2011。〈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新聞學研究》，108：183-223。
- 王志弘。2015。〈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理論性的探索〉。《城市學學刊》，6 (1)：1-28。
- 王品驊。2012。〈策展論述〉。收入謝宛真編《創作論壇：當空間成為事件 - 臺灣，1980 年代現代性部署》，7-13。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 王學琛。2018。〈代際差異與青年人情感結構轉型：對「喪文化」的質性研究〉。《熱風學術》，春季刊：50-65。
- 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李芝瑩。2017。〈從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理論探究「世界神明聯誼會」所呈現的宗教文化自覺〉。發表於「人間佛教與當代社會問題國際研討會」。越南，寧平省拜鼎寺，12 月 8-9 日。
- 李思薇。2005。〈文化事件中的停駐與遊走—以城市節慶彌拼台北的文化生活圖像〉。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吳承紘、關鍵評論網。2017。《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臺北市：月熊出版。
- 林宇玲。2014。〈網路與公共領域：從審議模式轉向多元公眾模式〉。《新聞學研究》，118：55-85。
- 林宗弘。2015。〈再探臺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6 (6)：395-436。
- 林芮緹。2017。〈世大運花兩百億貴嗎？如果能讓臺灣人找到民族認同不再自卑，這個錢非常值得〉。橘報，8 月 23 日。<https://buzzorange.com/2017/08/23/taipei-universiade-let-the-world-sees-taiwan/>。（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 馬上鈞、馬上閔。2010。〈大型運動賽會與都市永續發展議題〉。《休閒事業研究》，8 (1)：35-49。
- 馬元容。2003。〈從傳統節慶到新公共平台—以臺北縣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 翁志遠。2016。〈臺灣的世代戰爭：「年級生」的說法有意義嗎？「年齡」歧視或許比「年級」歧視更值得留意〉。關鍵評論，3 月 15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6831>。（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4 日）。
- 容邵武。2015。〈評論—莊雅仲，2014，《民主臺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89 頁〉。《全球客家研究》，4：239-246。
- 唐鳳。2018。〈社會創新：互動式演講〉。發表於「聚眾談 LabTalk | 社會創新與城市發展未來學」講座。臺北市，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8 月 28 日。
- 張少熙、黃睿宏。2009。〈舉辦大型運動賽事對城市永續發展之影響—以高雄 2009

- 世運為例》。《城市發展》，8：8-24。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
- 許光庶、黃建松。2006。〈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主辦城市形象塑造之探討〉。《中華體育季刊》，20（2）：65-74。
- 鈕文英。2015。《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二版）》。臺北市：雙葉書廊。
- 曾柏文。2022。〈城市慶典設計〉。發表於「府中文化沙龍：城市設計的六場激盪 EP.6」講座。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基金會，12月17日。
- 集思國際會議顧問、林冠文。2016。「國際大型賽事開閉幕儀典活動執行策略分析」。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14年12月—2015年5月。委託研究報告 103A263。
- 楊洲松。1998。〈哈伯瑪斯 (J. Habermas) 「現代性哲學論辯」與李歐塔 (J-F. Lyotard) 「後現代知識論述」的論戰及其教育意義〉。《教育研究集刊》，40：73-92。
- 臺北市政府。2017。《2017 臺北世大運開幕式手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
- 賴嘉玲。2016。〈英國倫敦奧運/帕運開閉幕式中的文創展演分析〉。收入劉以德編《歐洲文化聯盟文化政策之脈絡與實踐》，285-320。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 謝珮琪。2017。〈世大運近7成民眾不想買票，開閉幕卻要花3.6億 柯文哲：民間力量動起來，效果會很驚人〉。風傳媒，7月9日。<http://www.storm.mg/article/296190>。（檢索日期：2018年1月25日）。
- 羅德興、王明雯。2010。〈從超個人心理學的觀點看組織轉型〉。《中華科技大學學報》，42：269-286。
- 聯合報系。2018。〈願景工程 / 世代共好〉。UDN。<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11885>。（檢索日期：2018年10月4日）。
- 龔卓軍。2022。《交陪美學論：當代藝術面向近未來神祇》。臺北市：大塊文化。
- Chappelet, Jean-Loup. 2012. "Mega Sporting Event Legacies: a Multifaceted Concept." *Papeles de Europa*, 25: 76-86.
- Garcia, Myles A. 2016. *Secrets of the Olympic Ceremonies (3rd)*. Hayword: MAG Publishing.
- Getz, Donald, and Stephen J. Page. 2016. *Event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for Planned Events (3rd)*. London, UK: Routledge.
- Glesne, Corrine and Alan Peshkin. 1992. *Beco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Longman Pub Group.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8. *Generational Conflict*. Website: <https://hbr.org/podcast/2018/03/generational-conflict> (Accessed Oct. 12, 2020).
- Kageyama, Yuri. 2016. *Super Mario Marketing op in Rio Cost Nintendo How Much? Zero*. Website: <https://apnews.com/b962272744fe414398b2d2f2a2fcca5f/super-mario-marketing-op-rio-cost-nintendo-ow-much-zero> (Accessed Jan. 25, 2018).
- Kasimati, Evangelia. 2003. "Economic Aspects and the Summer Olympics: a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5(6): 433-444.
- Lincoln, Yvonna S., and Egon G. Guba.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SAGE.
- Merriam, Sharan B.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 (2nd)*.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Wiley.
- Mobley, Alex M. 2008. "Sharing the Dream: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Beijing." *Journal of*

- Sport & Social Issues*, 32(4): 327-332.
- Moon, Russell D. 2012. *Days of Wonders: Inside th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Colchester: The Oak House Partnership.
- Preuss, Holger 2015. "A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the Legacies of a Mega Sport Event." *Leisure Studies*, 34: 643-664.
- Rossman, Gretchen B., and Sharon F. Rallis.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Learning in the Field (4th)*. Thousand Oaks: SAGE.
- Silvers, Julia Rutherford, and Kathleen Beard Nelson. 2009. "An Application Illustration of the Even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EMBOK)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Using the Design of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ies." *Event Management*, 13(2): 117-131.
- Tomlinson, Alan. 1996. "Olympic Spectacle: Opening Ceremonies and Some Paradoxes of Globaliz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583-602.
- Uri, Therese. 2015.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using situational analysis grounded theory as research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 Qualitative Research*, 10(2): 135-151.
- Zimbalist, Andrew. 2010. "Is it worth it." *Finance & Development*, 47(1): 8-11.
- Zimbalist, Andrew. 2016. *Circus Maximus: The Economic Gamble Behind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up*.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